

与甬上诗书名家书翰往来

周退密出身名门，家族世居宁波，为甬上巨富，后在上海发展，是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受父亲周聚非熏陶，周退密自幼爱好书法。他在《我的闲章》一文中说：“好像一生中从未放弃过毛笔。”家中原有不少碑帖，后来又从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购回大量珂罗版石印碑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学养丰厚，从鉴赏、临摹碑帖和拓本到自成一派，使得周退密对书法有着独到的体验和见解。

周退密主要书写的是他本人的诗词作品，诗书盈香，相得益彰，其中有着真正的文脉与学养、人格，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体现了完整的书法形态，也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厚实功底。他自言，退休以后，用毛笔的机会越来越多，抄书、起稿、写信多半是用毛笔。年过百岁时依然临池不辍，健笔凌云，人书俱老。2019年，上海文汇报举办“盛世风华：上海文史研究馆书画艺术作品展”，作为当时最年长的馆员，106岁高龄的周退密欣然提供《读书破万卷，落笔超群英》等书法作品参展。

周退密与甬上诗书名家时有往来，他和周节之、周律之兄弟交往是一段书林佳话。

周退密的表兄王石1949年后从上海迁居宁波，王石爱好书法，自己写的也很不错，被老师冯君木赏识。冯君木是甬上文化名人、著名教育家，他的书室“回风堂”名流云集，是宁波当时的“文化中心”，冯先生门下弟子有沙孟海、陈布雷、葛夷之等人。

王石在宁波结交了很多书法篆刻名家，甬上“翰墨林”印社的第三代传人周节之是其中之一。周退密通过表兄王石结识了为人端方的周节之，赞他“书法篆刻，箕裘克绍”，经常与之书翰往来，切磋书法技艺。周退密曾在给周节之的一封信中写道：“令祖工书法，但未尝有馆阁习气，珠圆玉润，颇近松雪一路，但厚重稳健，无松雪姿媚之态。”周节之为周退密篆刻的数方印章，被周退密经常使用。

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书法篆刻家周律之是周节之的胞弟，兄弟二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2012年《周律之书法篆刻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周退密为之作序。在序中，周退密提到：“后二十年，余又因节之而获交其胞弟律之，君美之姿，恂恂儒雅，一似文弱书生。”但是看周律之对客挥毫，却是免起鹤落、一挥而就，“连书多幅不倦，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为之敛手叹服。”他说周律之少时家学渊源，得到父亲和兄长的教导，后来又师从沙孟海先生，书业猛进，赞扬周律之的书法有法有则、有学有识，今日书坛一般是赶不上他的，而且如果只以“沙体”来论，也是小看了周律之。

年已九十的周律之向笔者回忆起请周退密作序的情景：“当时我是和陈大楹一起去的上海，先生的家在安亭路，去过两三趟。先生说话很温和，也很关爱后辈。”那一

7月16日，甬籍一代文史大家周退密在沪上驾鹤西去，享年107岁。

1914年，周退密出生于月湖畔，童年时代随母亲在家乡生活；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早年曾任上海法商学院、大同大学教授，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和《法汉辞典》编纂工作；1988年起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周退密的经历丰富而传奇，职业头衔有中医、执业律师、汉语言文学教授、法文教授、诗人、书法家、古籍碑帖鉴赏家、文史研究专家，凡传统文人的雅嗜，皆有造詣。著有《周退密诗文集》（黄山书社出版，近100万字）《墨池新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与宋路霞合著）《退密楼诗词》《安亭草阁词》等。

周退密热爱家乡，与甬上书法篆刻名家、诗人多有书翰往来，还向家乡图书馆和博物馆捐赠手稿、著作、文物，彰显了甬籍大家化私为公的博爱精神和拳拳赤子爱乡之情。



# 越鸟南枝 情系故里

## ——缅怀文史大家周退密

陈青

次，他们“班荆道故”，讲以前在宁波的往事，提到为书法篆刻集作序，先生欣然应允。

序中还附上了周退密祝贺周律之书法篆刻展的四首七绝，有“甬上风华盛昔年，北碑南帖韵翩然。愿君更着生花笔，别撰四明今墨编”“泼墨临池日散心，一杯佳茗豁灵襟。羨君卜宅居湖上，许我他年策杖寻”等，对故乡的情谊，清晰可见。

周退密小学就读于月湖西畔的省立四中附小，毕业后在湖西马衙漕秦氏宗祠旁的私塾清芬馆攻读经史古文，他与施蛰存、苏渊雷、郑逸梅、何满子等著名文人学者交好，诗词与文事的修养又得益于年轻时的刻苦学习。在刘梦芙的《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中，周退密被誉为“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周律之曾主持宁波诗社，“毛翼虎老先生在的时候，曾聘请周退密先生为宁波诗社名誉顾问，他经常在诗社的刊物《宁波吟草》上与大家酬唱题贺，也感物抒怀。年过百岁仍坚持诗词创作，令人钦佩。”周退密的诗里，总是蕴藉着浓浓的乡愁，绕不开儿时时的在宁波的光景。他在《浣溪沙·忆故园》中写道：“客思绵绵落故园，童年岁月月湖边，藤花香满绿窗前。银杏树高巢白鹭，春榆风急播青钱，橹声人语隔轻烟。”

2014年6月出版的《宁波吟草》，刊登了周退密的红豆词四阙以及18首《拟月湖竹枝词》。第一首写故居，“新周家接老周家，偃月堤边一径斜。游客若来询故事，大槐树下蚁如麻”；曾经



周退密书大方岳第牌匾（陈青 摄）

就读的四中附小在冯公祠内，他写“冯公祠宇久荒凉，往事累感感海桑。他年若有重新日，不減咸都旧草堂”；他记忆中西西的两座书院，“月湖辨志两峰响，书院一双有替身。湖上文风如此盛，不知山长是何人”；写人间晚晴，“诗国泱泱乐太平，遥闻湖上路歌声。人情温暖诗情好，唱罢竹枝唱晚晴”……

### 赠书家乡图书馆助力地方文献收藏

拳拳游子心，卷卷寄乡情。周退密一直非常关注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鄞州区图书馆探索名人捐赠文献的收集、

保护和传承工作，设有地方文献馆，周退密是最早一批捐赠书籍的名家之一。

历时十余年，周退密共捐赠了545册书籍，以文学、诗词类为主。其中近100万字的《周退密诗文集》和《墨池新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为周退密著作或编辑的作品。鄞州区图书馆为周退密设立了名人专柜，工作人员也曾多次前往上海拜访周老，“每次我们上门拜访时，周老都会事先准备好一批书，让我们顺便带走。”有一次，工作人员向他提出，能不能为地方文献陈列室题写室名，周老欣然同意，当即泼墨挥毫。曾在鄞州区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工作的马霞维，是鄞州文化界中与周老走动较多的人之一，“周老身上有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和风骨，是通达世事并能够把一切都放下的人，他的那种境界在当代人身上很少见，呈现出一种我很向往的理想文人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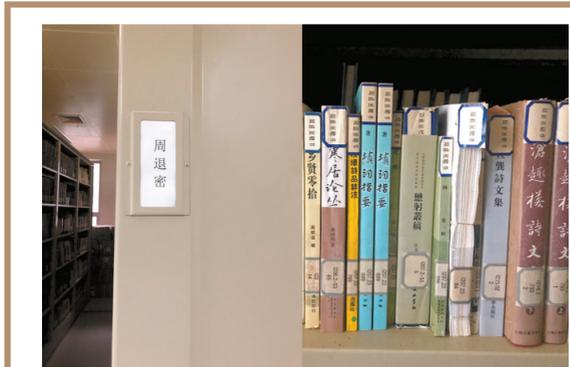
尽管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周退密一直牵挂家乡。鄞州区图书馆馆长胡春波说，她去上海安亭路好几次，年过百岁的周老几乎不出门，但每天仍看书写字，身体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思维敏捷，对于来自家乡的客人非常热情。“听说周老身体不太好，本来打算今年去探望他，但因疫情没有成行。为了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追悼和哀思，鄞州区图书馆将策划一个纪念展，把周老之前捐赠的作品进行梳理和展陈。”

### 化私为公捐赠天一阁珍贵古籍书画

天一阁和月湖总是联系在一起，天一阁·月湖也一直深入周退密内心。镇明路上的大方岳第曾被辟为月湖史迹陈列室，牌匾亦由周退密先生所书。

他在自传中写道：“童年时代随母亲在家乡生活。家里有两所父亲营造的住宅，都濒临月湖，环境优美，得天独厚……”2012年，周退密在给家乡的信中说，自己侨居上海七十年，“越鸟南枝，对于故乡月湖之水，天一阁，绝未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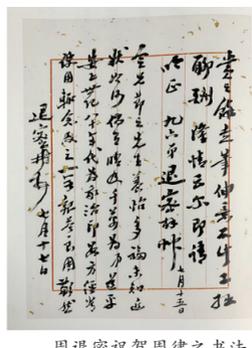
2013年，周退密将其收藏的古籍、字画、手稿、出版物等共近百件（76种97件）藏品捐赠给天一阁，其中的珍品有清代浙江首位状



鄞州区图书馆辟设的周退密专柜和周退密赠书（鄞州区图书馆提供）



周退密捐赠给天一阁的《先总宪公日记》等珍贵收藏（天一阁博物馆提供）



周退密祝贺周律之书法篆刻展的诗作



周退密赠送周律之的书法集（陈青 摄）

曲水

笔者自小喜欢阅读，所以一直觉得阅读不是一件值得大肆夸耀、宣扬甚至歌颂的事。不读书，也并不代表此人就道德低下，粗俗可鄙。相反俗语有云：“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当然，阅读能够增加知识、拓宽眼界、滋润心灵，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那是不争事实。

之所以絮絮叨叨先说了一大堆，源于对近期一则新闻的感想。新闻说的是长期在广东打工的湖北籍54岁农民工吴先生，在东莞图书馆留下一份语言朴素、情感真切“读者留言”。他说：“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有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我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来，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虽万般不



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

这段话最大的力量就是真实、道出了一位外乡打工者的心声。因为由衷感激东莞图书馆多年来给予他这个异乡客一处心灵得以休憩的场所，所以他情动于衷，写下了千字留言。而最令笔者动容的是那句“想起这些年来，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这几乎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天堂什么样，也许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有异曲同工

# 阅读本是寻常事

## ——由“农民工借别东莞图书馆事件”想到的

之妙。国家公立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大众开放的文化单位，在这里，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异，没有上下等级的分层。每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份：读者。在这里，你可以自由享受书籍带来的纯粹和美好。

那么，为什么在当下，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会成为新闻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部分人的隐秘心理。因为这位读者是农民工，很多人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社会底层”。而这样一个靠体力吃饭、日日承受着生活重压的人居然喜欢读

书，有人就觉得新奇了。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见：吴先生固然清贫、疲惫，也没有余钱去休闲娱乐场所消费，恰恰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东莞图书馆为他敞开了大门，让他得以在一个整洁、安静的环境中通过阅读，消除身心劳乏。这里书香袅袅，哪怕是暂时的，也能让你目明心清，世虑顿消。

这则新闻显示了一种社会价值评判。试想，如果吴先生在东莞从事脑力劳动，有着一份过得去的收入，那么他在图书馆读书之事可能

就水过无痕、波澜不惊了。究其原因，在社会隐形的评价体系中，吴先生十二年来去图书馆看书的行为是超越他所处阶层“需求”的。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图书馆该是一个更接近于知识阶层的场所。然而这位农民工却用自己的行动呈现了现实和观念的反差。加之现在他因疫情不得不离开图书馆，这就使得该事件更具备了感情上的渲染力，于是“新闻热点”形成了。可静下心来细想，很多人脑海中这种自以为是的逻辑，或许是有问题的。

将“农民工”与“不看书”画等号，揭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偏见。人们在该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怜惜、感佩之情，也部分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吴先生们”存在着不露声色鄙薄和轻视。这让我想起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小说《刺猬的优雅》。故事主人公是巴黎左岸某座公寓里的一个粗粗胖胖、其貌不扬的女门房。所有人认定她平淡无奇、庸庸碌碌。而其实，她是个腹藏万卷诗书，有着精致且高雅灵魂的女子。

与其将阅读推崇为一件高尚美好的事，我倒更希望人们将它认定为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寻常之事。至于图书馆对农民工的接纳，本来就是职责所在。图书馆，包括其他社会公共、公益文化部门，只有接纳形形色色的人，才有形形色色的人愿意进来，那才算成功，才真正达到了吴先生在留言中所祝愿的那样——是“兴旺”的！